

1978年彭德怀骨灰 回归八宝山公墓始末

■（河南）马 涛

1978年，彭德怀被彻底平反昭雪。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庄重的彭德怀同志追悼大会。会后彭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堂西一室，紧挨着老战友朱德的骨灰盒。这位功勋卓著而又蒙受巨大冤屈的开国元勋，终于回归到他所应有的位置。



1950年，毛泽东与彭德怀在中南海

然而，当年彭德怀含冤去世被火化后，他的骨灰保存下来了吗？放置在哪里？革命一生、功勋显赫的开国元勋彭德怀，死后竟然连骨灰都不能入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这是他个人的莫大冤屈，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奇冤！四年之后，他的骨灰又是怎样找到的呢？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经过了10年漫漫长夜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真正的春天。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决定为一批受迫害的老同志平反，也将为彭德怀昭雪。

筹备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一大难题：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哪里？他于1974年11月29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在正常情况下，骨灰盒应存放在北京，而实际上，彭德怀的骨灰却下落不明。这一消息又把人们再一次推向更深的悲哀之中。党中央、中央军委立即发出指示，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运到北京。

彭德怀的骨灰怎么处置了，放到了哪里？外人不得而知，就连他晚期唯一能见到的侄女彭梅魁也不得而知，一直是个神秘的谜。

1975年，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

统战部部长，李大章的夫人孔明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曾在太行山西北局妇委共过事，相处甚好。孔明进京以后，曾特地去看望过浦安修一次，并对她说，彭德怀的骨灰被秘密转移到了成都，此后李大章又告诉了她详细情况，但同时要求她绝对保密。

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浦安修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陈云。陈云在家中还给她留了一张小字条，告诉她彭德怀的问题将很快解决，三中全会决定给彭德怀、陶铸同志平反昭雪。浦安修顿时感到心中轻松了许多。

人死灰亡，这一沉痛的打击使浦安修时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她清楚地记得，1965年11月她送彭德怀去三线参加工作之后，两人一直未有机会见面。直到1967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批斗会上，老两口一起被拉到批斗台上时，她才偷偷看了彭德怀一眼，但却连一句话也没能说成。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偷偷的一瞥，竟成了她和彭德怀的永久诀别。唯一能使她得到一点安慰的是，彭德怀的亡魂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西南三线

工地。她明白：彭总离不开大三线，三线人民也热爱彭总。他虽然去世了，但他仍活在三线人民之中，相信彭总的骨灰是会妥善保存的。但又一想，在那个动乱的年月，老伴的骨灰难免不发生差错。因此，她又感到不安。当得知中央军委筹备彭德怀追悼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到处寻找骨灰时，她便立即向他们汇报了上述情况。

彭德怀的骨灰当年为什么会被存放到成都？

在“四人帮”控制的有关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有如下两段文字：

“受害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该专案办公室另一份记录上写着：“……中办秘书处电话告，王副主席在彭德怀死亡骨灰处理报告上指示：‘照报告上所提的办法办。’”这里所提到的王副主席，就是王洪文。

秘密送来骨灰盒的那两位军人，也讲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存放成都，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存放地点，以便今后查找时不致搞错的指示。

由此判断，在1974年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对彭德怀骨灰的处理办法，显然既包藏着“四人帮”的胆怯与祸心，也蕴含着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为保护彭德怀骨灰的策略和良苦用心。而将彭德怀元帅的骨灰长期存放于成都，这对当时已身患重病、身处逆境的周恩来来说，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恐怕也莫过于此了。

二

1974年冬季的一天早晨，有两位身穿军装的人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成都。其中一位姓李，30岁左右。他们带着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指名要见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刘兴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及省委书记段君毅。三位省委领导同志接待了他们。来者向他们传达了中央首长的指示：“我们送来一个骨灰盒，里面装的是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改姓送到四川存放。这个骨灰盒放在一般群众存放骨灰盒的地方就行了。放好后，不准任何人移动，要动须经中央军委批准。这些情况，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绝对保密。”



彭德怀与夫人浦安修在延安枣园

三位领导听后心里愣了一下。李大章清楚地记得，彭德怀是1965月11日底来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的，当时安排住在永兴巷七号。他以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四川省省长的身份多次去看望过他，共商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些事情。

这一突然而来的消息，使他一下黯然神伤，不知如何是好。沉思片刻后，他强自镇定，向两位军人表示：“省委一定认真存放好彭德怀的骨灰盒，绝对保守秘密。”

三位省委领导商量后决定，由段君毅安排负责，迅速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安全转移到成都东郊火葬场。段君毅把这个任务交给省委、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杜心源去完成，杜随即又打电话让办事组一位副组长张振亚具体负责办理此事，并严肃认真地说：“一个重要负责同志的骨灰已送到成都，你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存放好，没有省委批准，谁也不能移动。至于这位负责人是谁，我不知道，你们也不要打听，要绝对保密。现在你到锦江宾馆找中央专案组派来的两位军人联系承办。此事一定要办好，不可出现任何差错。”

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来到锦江饭店。两位军人告诉他：“我们奉命来到成都，中央首长及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送来一个人的骨灰盒。此人叫王川，男，他的骨灰盒须存放在成都。”张振亚回答说：“省委领导已布置安排了，请放心，我们一定将骨灰盒存放好，绝对保密。”二位军人还是不太放心，一再叮嘱：“骨灰盒一定要存放好，要绝对保密。”

当时四川省委正在锦江饭店召开地委书记一级干部会议。张振亚便打电话找来省革委会办事组行政处副

处长杜信，郑重其事地向杜信交代说：“有个骨灰盒，需要放在成都，这个事情你去具体办理一下，要绝对保密。办理过程中还需开什么介绍信，你开就是了。两位军人就住在楼下38号房间……”

杜信二话没说，便来到38号房间。两位军人正在沙发上坐着，见杜信进来，很有礼貌地起身让座，并从桌柜里取出一个用粗木板钉成的骨灰盒。骨灰盒上油漆尚未干，盒上贴了一张小条，写着“王川，男”三个字。杜信把骨灰盒放进自己的提包里，与两位军人并没办什么交接手续，便离开了锦江饭店。

从殡葬管理所出来后，杜信又马不停蹄地来到火葬场办公室，找到火葬场负责人辛自权老师傅。辛师傅60岁了，办事热情负责。杜信对他说：“有一个骨灰盒须存放在这里，这是省委领导同志交代我来办的。我已到市民政局和殡葬管理所去过了，他们叫我直接来找你联系存放。此事非同一般，你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妥善保管，不能遗失；第二，这个骨灰盒，没有我或省革委会办事处的介绍信，任何人也不能取走；第三，有什么变动或意外情况须立即通知我，我给你留下电话号码。”

辛自权师傅看了介绍信，又看了看骨灰盒，随即满口答应。并让助手张泽珍填写了一份骨灰寄存单，单子上写着这样一些字：

姓名：王川；性别：男；终年：32岁；籍贯：四川成都；火葬时间：74年9月；寄存时间：三年，自74年12月23日起，77年12月23日止；委托人姓名：杜信；是骨灰什么人：同事；通讯处：省革委会办事组；骨灰编号：第273号。

在发证记录栏内，杜信收证，并签了字，写上了年月日：74.12.23。

在填单过程中，杜信很费了一番思虑。他估计这个骨灰盒里一定装着一位重要领导同志的骨灰。但骨灰盒上除了“王川，男”三个字外，什么也没有，其他事自己又不知道。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中没有王川这个名字，他估计王川肯定是个化名。省委领导同志交代骨灰盒要长期保存下去，为了万无一失，他在填写年龄时没有写六十多岁或七十多岁，而是写了三十二岁。

临行前，杜信一再叮嘱辛师傅一定小心在意，不能有半点差错。

此后，张振亚与杜信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此事，但他们老是放心不下，曾悄悄到火葬场看过几次。

事隔几年后，省委凡知道彭德怀骨灰下落的领导同志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都先后调离四川去北京工作了，李大章也于1976年5月8日在北京病故。

就这样，化名“王川”的彭德怀的骨灰，一直在这里神秘地存放了整整四年。

三

1978年12月中旬，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晏、任二人到达成都。他们住定后，便持介绍信先到了省委值班室，值班室人员不知道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成都一事，便请示主管领导张振亚。张振亚此时已是省委秘书长，他这才明白，来人讲的“王川”的骨灰就是彭老总的骨灰，长久藏在心里的谜终于解开了。他立即驱车赶到成都东郊火葬场，见“王川”的骨灰盒安然存放在273号骨灰架上，心里感到由衷的欣慰。他叮嘱火葬场负责人妥为保存，才回来答复了晏、任两位军人。晏、任二人这才放心地返回北京。

张振亚感到事情重大，需和省委领导汇报商量。他向留在省委机关主持工作的杜心源书记汇报，杜心源听后立即指示：一定妥善保存好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并继续保密，听候中央安排。

1978年12月22日清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已派中国民航飞机来接彭德怀同志的骨灰，飞机在成都双流机场降落，彭总的骨灰要安全送到北京，24日中共中央要为彭德怀同志召开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杜心源指示，立即派人将彭德怀的骨灰从东郊火葬场取回，同时让张振亚与中央办公厅联系，问明举行什么仪式，是否要派人护送。

张振亚知道化名“王川”的骨灰是杜信一手经办的，立即让秘书打电话通知杜信速来见他。杜信匆匆赶来，秘书已在楼梯口等候他。当秘书迫不及待地将情况告诉他时，杜信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顿时泪如泉涌，两手捂着脸哭着走进了会议室。张振亚见杜信伤心地走进会议室，心里难过极了，一句话也没说，便将取骨灰的卡片交到了杜信手里。

张振亚、杜信及两位保卫干部，带上介绍信和卡片，坐上小车来到东郊火葬场取走骨灰。

杜信在车上抱着骨灰盒，车开到牛市口时，他叫司机停在一家商店门前，下车买了6尺红绸，将骨灰盒包起，然后直奔省委大院杜心源的办公室。

杜心源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正心急如焚地等待着。见张振亚等四人进门，忙起身迎上前去，伸出双手，从杜信手中恭敬地接过彭总的骨灰盒，轻轻地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然后领着在场的人站成一排，脱下帽子，沉痛地说：“让我们向彭总三鞠躬吧。”

简单的悼念仪式结束后，杜心源又向几个人交代说：“刚才已经与北京电话联系过了，下午必须将骨灰运到北京。这里正通知在家的省委常委与成都军区、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到会议室，向彭总的骨灰告别。你们快把彭总的骨灰盒移到会议室。振亚你去机场看看，飞机大约快到了。”

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听到消息后都大吃一惊。他们走进会议室，一些老同志看到桌上用红绸包裹着的彭总的骨灰盒，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杜心源简单地讲了几句，就领着大家向彭总的骨灰三鞠躬，并围着彭总的骨灰盒绕场一周，向英灵告别。

张振亚赶到双流机场时，见一架民航飞机已停在机场上。

他又根据省委的指示，与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组织部通话联系，请示骨灰如何送到机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傅学正在电话中告诉他：由在成都的彭总原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两位军人将彭总的骨灰护送到北京，并已通知了成都军区。

綦魁英、景希珍正准备乘12点的飞机去北京参加彭德怀的追悼会，省军区政治部通知二人说：“中央军委办公厅来电话，让你们把彭总的骨灰盒带到北京，飞机正在双流机场等着你们。”

綦魁英、景希珍二人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老首长彭德怀的骨灰竟会一直放在成都，还让他们带到北京去。二人惊醒之后，不由得泪流满面。

到成都军区后，政治部一位副主任立即带上綦魁英、景希珍二人赶到省委大院。张振亚向他们扼要介绍了当年彭德怀的骨灰盒送到成都的情况。

綦魁英、景希珍见到彭总的骨灰盒，一下扑了上去，泪如泉涌，悲恸欲绝。张振亚说：“我们刚才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让我们把彭总的骨灰盒送到成都双流机场，交綦、景二位带到机场并护送至京，你们正好来了，一定要安全送到。”

这时，楼外站着的省委机关干部越来越多，大家默默地看着綦魁英小心翼翼地捧着装有彭总骨灰盒的手提包走向汽车，目送着英魂离去。



1959年6月13日彭德怀结束出国访问后回到北京，在车站受到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的欢迎。

为了安全护送骨灰，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四川省军区领导未到机场送行。张振亚与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陪同綦魁英、景希珍等同乘一辆面包车，经过人民南路广场，向16公里外的成都双流机场飞快奔去。

机场负责人因事先接到电话通知，早已站在候机室门口台阶上等候。见两位军人手提提包，在张振亚等人的陪同下，疾步走来，连忙迎了上去。张振亚向这位机场负责人耳语了几句后，便将綦魁英、景希珍送上了飞机。不久，飞机便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在跑道上滑翔一段后，昂头起飞了。

飞机穿过云层，平稳地在云海上空飞行。两个多小时后，机组一位负责同志手持电报走到綦魁英、景希珍的座位旁，轻声告诉他们说：“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你们，因派专机来不及了，飞机到首都机场后，你们不要下飞机。旅客下完后，飞机还要从首都机场起飞，到西苑机场降落，你们在那里下飞机，军委首长在那里迎接彭总的骨灰。”

下午六时左右，飞机抵达首都机场，旅客下飞机后，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王承光沿着舷梯疾步走上飞机与綦、景二人见面。王承光也是彭总以前的秘书，三人无限感慨，但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细谈。王承光告诉她们：“等会飞机就要起飞了，绕北京城上空一周，到西苑机场降落，在那里举行迎接彭总骨灰的仪式。”

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后，夜幕已经降临。北京城灯火辉煌，天安门城楼、中南海的灯光格外明亮，照引着彭总的英魂归来。

当飞机在西苑机场停稳后，舱门刚一打开，便听见迎接骨灰的队伍中传来一片哭泣声。綦魁英控制住自己悲伤的情绪，双手捧着彭总的骨灰盒，站在机舱门口。此时，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及其他亲属彭钢、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等沿着舷梯走上飞机。彭钢从綦魁英的手中接过伯伯的骨灰盒，排成两行的党政军机关代表，忍不住泪如雨下，有的人竟放声大哭起来。

彭德怀的骨灰放在第一辆小车上，穿过两行肃立

的迎接骨灰的队伍，军人们以军礼目送着车子从自己的身边通过。后面跟着一串小车，护送彭总的骨灰盒至八宝山革命殡仪馆第一室存放。

“天涯何处觅冤魂，青山有幸埋忠骨。”经过整整四年的异地漂泊，彭总的英魂终于回来了，和他的老战友朱德、陈毅、贺龙永远安眠在一起了。

然而，对于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民族和一个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他当时被诬陷和掩埋，人民也不会忘记他的！历史和后人最终给了彭德怀公正的评价！

陈毅遭遇的“以貌取人”

1949年5月，陈毅任上海市市长。上任不久，他就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有一天，他到一个单位了解情况，办完事后，与警卫员小王一起步行往回赶。劳累了一天，肚子有些饿了，陈毅对小王说：“走，我们下馆子去！”

两人进了一家小饭店，刚一落座，一位五十开外的男服务员殷勤地招呼说：“两位客官，想吃点什么？”陈毅说：“来两碗阳春面，多放些辣椒。”服务员吆喝一声：“好哩！一十！两碗阳春面。”顷刻之间，两大碗鲜香的阳春面端上桌来，两双筷子摆得整整齐齐。陈毅一看：

嗨，碗里的面条装得满满的，辣椒放得多多的。心想，这家小饭店不错。

两个人正吃着，进来一位乡下人打扮的老汉，在陈毅对面的桌边坐下。老汉叫了半天服务员：“掌柜的，请来一碗阳春面。”服务员好像没听见似的，老汉叫了几遍，服务员不耐烦地喝道：“你喊什么？”老汉怯怯地说：“请来一碗阳春面。”“十一！一碗阳春面。”只见服务员向厨房吆喝了一声，然后干别的事去了。

过了一会儿，老汉的阳春面端上了桌。陈毅见那碗



陈毅元帅

面清汤寡水的，没有多少面条，分量只有自己碗里的一半。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放下筷子对服务员说：

“你过来！我是陈毅，你把刚才喊的‘一十’和‘十一’说给我听听是啥意思？”服务员这才知道坐在面前的是市长，不禁惶恐起来，红着脸说：“‘一十’是‘干’字，代表干部；‘十一’是‘土’字，表示土巴佬。”

陈毅道：“哦，我明白了，这是你和厨房大师傅约定的暗号，看到干部模样的人就喊‘一十’，饭菜的份量就多些；看到土巴佬就喊‘十一’，饭菜就给得少些。你去把

你们老板叫来。”

饭店老板来了，连忙赔不是。陈毅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干部和普通百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的不同。你们办饭店，一定要诚实守信，顾客至上，童叟无欺，官民无欺啊！”短短几句语，说得老板和服务员都低下了头。后来，陈毅多次派人来暗访，这家饭店再也没有出现过以上情况。

（摘自《党史信息报》 作者：谈宜斌）